

学苑春秋

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
任士英 主编
河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学苑春秋:20 世纪国学大师档案/任士英主编. -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6. 11
ISBN 7-215-06064-0

I. 学… II. 任… III. 国学-名人-生平事迹-中国 IV. K82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13079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23341)

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34

字数 560 千字 印数 1-7 000 册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45.00 元

本书对国学大师的描述，每人单独成篇。“档案”一词意在提炼和浓缩内容，述及大师的家世游学、师友往来、学业传承、治学经历及国学著述，尤重提炼和概括大师的治学精神、方法和特点，彰显大师特立独行的人格魅力和人间情怀。抱憾传统学术之中衰和有志追慕前贤的读者，可用较短的时间领略大师的学识和风采。

读史·阅世·新元素书坊

◎名家评说中国著名皇帝 肖黎 主编

◎学苑春秋

——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 任士英 主编

◎九世鸿基一旦休

——宋徽宗亡国前后 任崇岳 著

◎说南唐，话李煜 任崇岳 著

责任编辑 张前进

责任校对 李宝珠

封面设计 孙宪勇

版式设计 胡颖君

序 言

在“国学热”方兴未艾的形势下,任士英教授主编的《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一书,应时出版,值得庆贺。

士英教授命我作序,我本该谢绝——人贵有自知之明,不具备写序的资格而厚颜为之,难免贻笑大方。但是,在与士英教授几番交谈之后,我还是斗胆应承了下来。这里有两个原因:其一,我尊敬士英教授和他的学术责任感。士英教授与我是相交多年的朋友,我敬重他对学术的敏感和执着。他慨然谈及《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的编写宗旨:“向大众普及国学大师的有关知识,传承大师的精神和思想,弘扬大师的道德和文章,唤起社会尤其是青少年对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对愿意用心做这一工作的学者,我们应该表示感谢。其二,本书的内容与我的工作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成立之后,我被任命为常务副院长,在学校领导和冯其庸院长的信任与支持之下,主持国学院的日常工作。转眼就是一年的光景,其中的酸甜苦辣,诚不足为外人道。我相信,对“国学”的体悟,是因人而异的。对我而言,它意味着深奥精妙的知识体系,背景各异的学术论争,不容推卸的社会责任。即以后者而言,我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所做的一个节目中,现场曾经有人提问:“你对国学院学生毕业之后找工作的前景如何判断?”应该说这是一个有挑战性和

预测性的问题。我当时有大意如下的答复：“这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首先是社会上对国学重要性的认知程度，其次是我们的教育质量。如果大多数人认定国学是当今中国人非常重要的人文素养，如果人大国学院的学生被认定为这个学科领域最好的学生，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相信，他们的择业前景将是一片光明。”作为建立自信的两个前提之一，国学的社会认知程度如何得以提升？显然，需要有人孜孜不倦而又扎扎实实地做好国学知识的普及和宣传工作。

同样的话题还出现在“百度国学频道开启仪式”之上。我以嘉宾身份参加了这一仪式。主持人发问“可不可以把国学办成一个类似于汉堡包似的东西”，我接过话题说：“我理解我们的主持人是在调侃，其实他要表达的是国学知识普及化的诉求，希望国学能够走出学术的象牙塔，而为社会大众所喜闻乐见。我个人认为，现在推广国学应该是有不同层次的，精深的专业研究当然不可或缺，同样我们也有责任让更多的人了解国学。”

我之所以再三强调面向社会宣传国学的重要性，是因为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事实：在经历了半个世纪的冷落之后，国学作为一门整体的学问，在国人的视野中已经被淡忘了，甚至受到部分人士的排拒。在这一背景之下，如果真正有志于振兴国学，就必须从引导国人重新接触国学、接纳国学开始。在这个意义上说来，普及是精深研究的基础和前提。

以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的成立为契机，教育界、文化界形成了讨论国学的热潮，并引起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有媒体因此而将2005年称为“国学年”。进入2006年之后，关注国学的热情仍有增无减。《光明日报》开辟了《国学》专栏，作为一种意蕴深刻的文化信息，受到海内外的广泛关注，本在情理之中；若干与国学研究相关的论著出版之后销量大增；已经有多所大学准备兴办国学专业；多位原被称为“文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书画家”的著名学者，被改称为“国学家”乃至“国学大师”；由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举办的“国学与和谐社会”学术讨论会，在上海浦东举行，其关注国学与现实问题的价值取向引人注目；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主办的“国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学术讨论会上，来自不同学府的多位教授，在发言中呼吁有关部门尽快批准设立国学专业，以适应国学教育发展的需要；“北大乾元国学教室”的高额收费以及报名者依然踊跃，一度引发议论纷纭；不久前，上海市教委叫停上海“孟母堂”的读经之举以及被诉诸法律；新浪网“乾元国学博客圈”的推出，给国学讨论提供了一个开放的网络平台。上述文化现象足以证明，国学继续是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问

题,是不争的事实。

与《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一书关联最为密切的文化事项,大概应该首推由国学网、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网联合主办的“我心目中的国学大师”网上评选活动。这一活动吸引了包括台湾、香港及海外华人学者在内的广大网友参与讨论,共收到来自两岸三地以及海外华人的120多万张选票。我注意到,在网上的讨论中出现了几个较为集中的问题:什么是国学?国学是不是儒学?国学大师的标准是什么?某些人物(如鲁迅)被称为国学大师是否合适?这些问题的学术底蕴都是很丰厚的。在一个崇尚理性思考、尊重多元文化的社会中,我们应该欢迎在这些问题上的见仁见智。我无意求证《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的编写与此次网上评选活动是否有内在的联系,但我相信,编写者对以上讨论意见,应该是有所思考、有所借鉴的。一为网络世界的开放式讨论,一为传统出版物,两者相得益彰,是否可以称之为2006年国学知识普及教育的两件盛事?

今天,对抱憾传统学术的中衰和有志追慕前贤的人而言,了解上个世纪的国学大师的治学特点、人格魅力、传记资料乃至轶闻趣事,都是富有意义的。我认为,可以与读者一道用“开卷有益”来表达对《学苑春秋——20世纪国学大师档案》的期望。它对读者的启迪应该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其中也可以包括对本书的内容所引发的思考。如,鲁迅先生是否应该入选“国学大师”,就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如果从其学术旨趣而言,鲁迅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抨击之激烈,是学者所熟知的,从这一角度说来,假如鲁迅先生地下有知,得知自己被列为“国学大师”,也许他会“吹胡子瞪眼”;如果从其研究对象与研究水准而言,仅凭《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字史纲要》两部名著,鲁迅先生被尊为国学大师也有足够的理由。由此一例可见,提出一个明晰而无争议的“国学大师”标准,似乎并非易事。

借着关于鲁迅先生的话题,我愿再赘数语。当年的鲁迅先生,曾经对部分以传承传统文化自命的学人出语讥讽,但对王国维先生却另有一番评价:“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作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400页)这里最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不是鲁迅先生对王国维个人的评价,而是他的学术眼光——重视运用新出简牍资料来重新认识传统文化的人,才是真正的国学栋梁。如果我们认可鲁迅的

思路,就应该得出一个观点:那些仅仅把整理传世文献视为国学之业的人,视野与胸襟均难免褊狭之讥。生活在 21 世纪的我们,对国学的态度,应该是充满理性的。国学应该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而非崇拜对象。国学当然是中国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基因,更是中国学人应该具备的素养,但只有把它置于文化多元的格局之下才有意义,如果有人意图把国学与当代文明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则是愚蠢的举动。研究国学的具体方法,则应该是与时俱进的。只有站在学术前沿的研究,才是有价值的。

我们这一代人,对于国学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重大缺陷,这是以否定传统为荣、甚至宣称要与传统“决裂”的时代所造成的悲哀。但愿年轻的一代,可以在宽松、宽容的气氛中,自由地学习国学,从中汲取为人处世的精神财富。

借鉴前辈学术大师的治学经验,可以使后人在学习和探索的过程中有所遵循,减少失误。仅从这一意义上说来,《学苑春秋——20 世纪国学大师档案》也是应该向广大读者真诚推荐的。当然,本书的价值,应该由潜心读过的人加以评说。

孙家洲

2006 年 8 月于北京

前言

人类历史步入 21 世纪的时候,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起来。各种科技手段的发明、诞生和进步,越来越强烈地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内容和行为方式。在这样的時候,我们来回顾传统、总结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就显得越来越重要和迫切了。因为,越是科学发展、越是技术进步,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就越能够得到体现,对传统文化的需求就越迫切。人类历史数千年发展史证明了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一个民族要保持经久不衰、绵延不绝,只有倚赖其文化传统和文化的发扬光大。北京大学教授季羨林先生曾倡言:人类社会的 21 世纪将是东方文化的世纪。2008 年的第 29 届北京奥运会会徽“中国印”和 35 个奥运会体育图标“篆书之美”,无不体现出传统中国汉字的架构和意趣。文化因子的活力和文化的传承,无疑有赖于代代先哲圣贤对赓续传统文化的理性自觉,有赖于他们不避生死和困厄的艰苦卓绝,有赖于他们百折不回的坚守和处乱不惊的刚毅。横渠(张载)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几乎成为秉承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文化宣言。在构建和谐社会、追求和谐发展的新时期,传统文化中先哲所秉持的自律自强、忧国忧民、百折不挠、宠辱不惊、明辨笃行、克己礼让、悲天悯人等人文情怀,无一不显示着巨大的生命力和现代价值。

—

20 世纪的中国,处在世界格局急剧变化的浪潮之中。旧日自成一统的天朝大国突然遭遇了千年未有的巨变。20 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坛风云变幻,云谲波诡,从清帝逊位到中华民国建立,从袁世凯洪宪帝制的闹剧、国民党南京政府逃离大陆到中国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在选择中前进,民族在炼狱中新生。学林人物一如芸芸众生,同样也经历着劫难和洗礼、选择和抗争。

这一时期按照现代学术轨制建立起来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学堂,给学林人物的人生选择和安身立命提供了新的舞台。我们无意比较或讨论师在学堂与师在王官的优劣,至少同他们的前辈相比,20 世纪的学林人物更多了一个激扬文字、表达思想、传道授业的途径和场所。事实上,20 世纪的学术大师本身也都程度不同地得益于这一现代意义的学堂制度。在这个群体身上所展示的共性的东西,鲜明地呈现出他们的学术品格和治学的时代特征:第一,他们都是学有专长的大学问家,这是他们能够成为一代大师的基本条件。第二,他们都具有超越他人的“通识”。上下贯通、纵横捭阖,汪洋恣肆,差不多是他们的共性。第三,他们发明了新的治学方法和路数,而且能够给后来者树立典范。既开风气又为师,示来者以规则。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垣的校勘法等,均能够给后人指示门径。第四,他们中的大多数具有留学背景,能够熟练掌握一门或者多门甚至数十门外语,作为治学的工具,这使他们的交流和吸收新的学术方法变得轻松和便利。事实上,这也造就了中国学术发展在进入 20 世纪以后的一个重要特色,那就是融会中西,以外来学说观照中国传统文化,以本土固有的思想和价值观审视外来学说。当初吴宓先生在《清华开办研究院之旨趣及经过》一文中就直言清华国学研究院“取材于欧美学者研究东方语言及中国文化之成绩”。其实就是治学旨趣上体现着追求“知己”和“知彼”的法门。事实上,20 世纪中国学术界的研究领域得到极大开拓,一些新兴学科的勃兴正与此紧密相关。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交流与上下五千年的融会贯通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挖掘和整理焕发出新的光彩。

当我们重温中国 20 世纪学术史的时候,这一印象越发深刻。一位位学术大

师鲜活的形象会扑面而来,他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显示出的学术品格与文化精神,就像一座座无言的丰碑,矗立在学林之中。本书中所述国学大师,就是从这样一个群体中选择出来的。

二

现在看,对于“国学”的理解和表述,仍然是一个充满挑战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仅仅局限于“国学”概念的界定是危险的,也是充满陷阱的。换句话说,在当下文化知识界,关于“国学”、“国学大师”的标准依旧是聚讼纷纭。事实上,这一问题从来就没有过“标准答案”。通行的工具书如《辞海》中对“国学”的定义为“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并和“国故”等联系起来;《现代汉语词典》也把“国学”称为“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这其实透露出长期以来对“国学”概念莫衷一是的一种无奈。

“国学”本来是中国典籍中固有的一个词语,乃是古代国家设立的学校。在20世纪西学浪潮腾涌而来的时候,有人是相对于“西学”提出“国学”的。梁实秋说,“把本国土产的学问叫做国学”,“国学便是一国独自形成的学问,国学便是所以别于舶来的学问的一个名词”。

但是,20世纪初的学术界对于“国学”这个名词的使用并不是真的这样简单明了。“国学”一词被赋予独特的文化内涵被广泛使用过。像章太炎办国学讲习会、国学振兴社在当时遐迩闻名,他的论说中有一个说法很值得琢磨:“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即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章太炎:《国学讲习会序》)他还说:“国学之不知,未有可以与言爱国者也。”谢无量、廖平、刘师培等也创建了国学馆(后改名国学学校、国学专门学校)。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谋办《国学报》以后,以“国学”为名称的书刊层出不穷。像1908年北京创办了《国学萃编》,罗振玉、王国维于1911年在北京、1914年在日本创办了《国学丛刊》,1919年3月北京大学文科编辑出版了《国故月刊》、1923年胡适等在北京大学创办《国学季刊》。然而无论是成立的组织(如1903年就出现的“国学社”)还是创办的诸多刊物,他们对于“国学”的理解都不尽一致。胡适

创办《国学季刊》倡导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系统地整理国学的材料并开展比较的研究,也就是“整理国故”。而刘师培在《国故月刊》发刊词中则明确“以昌明中国固有之学术为宗旨”。1906年邓实在《国粹学报》上的《国学讲习记》,早就把“国学”归结为“一国所有之学”。曹聚仁先生在比较皆以“国学”为旗帜的北京大学之国学研究所、无锡之国学专修馆和上海同善社之国学专修馆三者的“国学”时,这样评价说:“北大的是‘赛先生之国学’,无锡的是‘冬烘先生之国学’,而上海的则是‘神怪先生之国学’”,三者“决无合作之余地”。陈独秀说得更加直接:“国学是什么,我们实在不太明白。当今所谓国学大家,胡适之所长是哲学史,章太炎所长是历史和文字音韵学,罗叔蕴(罗振玉)所长是金石考古学,王静庵(王国维)所长是文学。除这些学问外,我们实在不明白什么是国学?”

从20世纪初,人们就对这一话题有过不同的解说。梁启超在《治国学杂话》中谈“国学”的修养,明白说是要“读中国书”,而他又是把“诸经、诸子、四史、通鉴等书”视为中国书中最宜精读的部分,显然是把“所谓中国学问界”的当代本色看做“治国学”的。他在给《清华周刊》记者的书信中回答“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时,也以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为对象。蔡尚思先生在早年的《中国学术大纲》中认为:“国是一国,学是学术,国学便是一国的学术。”“中国的固有文化,都不能出此国学二字范围外。”到了1993年3月,北京大学袁行霈教授在其主编的《国学研究》发刊词上,也宣布国学是“作为固有文化传统的部分”。当代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国学’这个词,有很多含义,其中一个重要的含义,是相对于晚清以后大量涌入中国的‘西学’而言。从这个意义上说,国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国学有点像外国人说的‘汉学’,汉学就是中国的学问,它不只代表汉民族的文化,而是代表整个中国文化。”1993年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国学大师丛书”时,把“国学”称为“近代以降中国学术的总称”,“国学大师”乃是“近现代中国有学问的大宗师”(钱宏:《重写近代诸子春秋》)。近年,讨论这一问题者都习惯引用钱穆先生在《国学概论》序言中的一句话:“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其范围所及,何者应列国学,何者则否,实难判断。”而专门讨论这一问题者,可以参考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5期)和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等论著以及近期“国学网”上的热烈讨论。陈独秀曾经说:“国学”这一名词,“就是再

审订一百年也未必能得到明确的观念,因为‘国学’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至少现在看来,这话还真让陈独秀说中了。

对“国学”概念和这一名词界定虽然不容易,理解和表达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都没有超越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因子。从20世纪初的民间“国学社”、北京大学“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和厦门大学、四川大学等“国学院”,到21世纪中国人民大学设立的“国学院”,既有血脉相连,又有发展的内容。毕竟,一代之学术,必有其一代之新内容,而新内容也往往需要在传承中实现。

三

本书对国学大师的描述,每人单独成篇。书名中借用“档案”一词,目的是为了提炼和浓缩内容。除了向读者介绍有关大师的行状,就是希望读者在不很长的篇幅内,用较短的时间了解大师的学识和精神。每篇基本包括这样的内容:

1. 平生故事:在介绍大师生平的同时交代其家世渊源、师友杂记、求学经历和学术历程。介绍生平履历是希望给读者留下感性认识,看到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
2. 国学春秋:主要介绍大师的学业传承、国学成就、著述与贡献等,以明确大师之所以成为大师的理由与条件。
3. 治学精神:重在対大师治学理念、方法、特点以及对后世治学影响的提炼与概括。如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文史互证”、“发覆史学”等,也可以侧重其人格魅力的描述。
4. 名家评判:与大师同时期以及后世学界名家(包括门生弟子、家庭成员等)对大师道德文章的认识和评价。因为各位大师的情况各有不同,具体的项目酌情增删,以掌握他们不同的特点,突出个性化特色。
5. 相关阅读书目推荐:既为了说明写作中的参考文献,也为了向读者推荐作进一步延伸阅读,以详细了解大师的有关资料。

虽然我们按照人物传记的要求叙述大师们的行状和事功,但对他们评介时,我们并不关注对人物的臧否,而在于学术的挖掘。从他们的特立独行和卓然有成,展示其学术品格、感受其学术魅力。事实上,大师们的事迹是如此丰富,其学术成就又是那样博大精深,限于体例和篇幅,我们的描述也只能是粗线条的。比如,笔者的乡贤傅斯年先生是一位性格鲜明的学者,“大炮”、“老虎”的绰号已不言而喻,他深受学生的爱戴。数年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何兹全先生作为其学生在凭吊他的墓地时双膝叩拜的一幕,使人深深被打动。无疑,如果我们能

够多关注大师行止中的一些细节,对于理解他们的事功言论会有更神奇的帮助。试举一例,1923 年,胡适应清华学生之请,开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图书共 190 种。在这个书目中因为列有《九命奇冤》、《三侠五义》等通俗小说,梁启超对此很“不赞成”,认为胡适做这件事应该“并不为国学有根柢的人着想,只为普通青年人想得一点系统的国学知识的人设想”。他表示,自己就没有读过这两部书,但要说自己“连国学最低限度都没有,我却不服”。其实,了解《九命奇冤》的人都知道,广东人吴趼人创作的这部 36 回的公案小说,最初就是发表在《新小说》杂志上的。《新小说》杂志又是梁启超在上海创办的,按照阿英先生的说法,吴趼人就是“至梁启超创《新小说》,始作小说”(《晚清小说史》)。那么,被胡适极力推崇的《九命奇冤》,梁启超说没有看过,我们很难以相信。这些故事对于接近大师们的内心和理解国学是会有帮助的。再比如,1939 年前后,国民政府教育部长陈立夫三度训令西南联合大学必须遵守教育部新规定,包括教育部核定应设课程,统一全国院校教材,举行统一考试等。冯友兰先生以文学院院长身份按照西南联大教务会议的决定致函抗辩。此函云:“部中重视高等教育,故指示不厌其详,但准此以往则大学将直等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中一科,同人不敢,窃有未喻。”“夫大学为最高学府,包罗万象,要当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岂可刻板文章,勒令从同。惟其如是,所以能推陈出新,而学术乃可日臻进步也。今教部对于各大学束缚驰骤,有见于齐而未见其畸,此同人所未喻者一也。教部为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大学为最高教育学术机关,教部可视大学研究教学之成绩,以为赏罚。但如何研究教学,则宜予大学以回旋之自由。此同人所未喻者二也。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此同人所未喻者三也。今教授所授之课程,必经教部之指定,其课程之内容亦须经教部之核准,使教授在学生心目中为教育部一科员之不若。此同人所未喻者四也。”“……盖本校承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之旧,一切设施均有成规,行之多年,纵不敢谓为极有成绩,亦可谓为当无流弊,似不必轻易更张。”(徐百柯:《冯友兰:今人谁识冯芝生》,《中国青年报》,2006 年 3 月 29 日)这一封信,在理解这位大师时比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的价值毫不逊色。

不仅如此,本书所涉及的大师名单中,也存在有太多的遗漏。像被近代著名学者和教育家李肖聃先生称为“长沙阁老,季清巨儒,著书满家,门庭广大”的王

先谦(1872 ~ 1917)、被吴晗称为“青年时代是新月派诗人,中年时代是旧经典的研究学者,晚年成为青年所爱戴、昂头作狮子吼的民主战士”的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先生就很典型。其中,像闻一多先生在楚辞唐诗、古文字等方面的国学造诣举世公认,他的同事、同时也是大学问家的浦江清教授在西南联大时对他有一段描绘:“文坛先进,经学名家,辨文字于毫芒,几人知己;谈风雅之源始,海内推崇。……黄济叔(明朝篆刻大家)之长髯飘洒,今见其人;程瑶田(清代经学名家)之铁笔恬愉,世尊其学。”就足以叫人想象其风采了。这方面的遗漏,我们还可以举出一长串名字:沈曾植、陈梦家、张君勱、朱自清、林宰平(志钧)、蒙文通、杨树达、余嘉锡、钱基博、欧阳竟无、董作宾、高亨、杨联升、周予同、洪业、周一良……

事实上,我们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将 20 世纪中国学坛的宿将名儒囊括无遗,这从另一角度例证着 20 世纪中国学术的辉煌。

本书收录的大师名单,是以生活在 20 世纪的学林为主体的。目次的安排,按照他们去世的时间排列(也就是说,本书收录的人物都是业已作古的大师)。同一年去世者则按照出生时间的先后排列。这也是为了方便读者把握他们一生活动的轨迹。这是应该说明的。这其中最早的是俞樾(曲园),他在 1907 年去世,他是作为章太炎的老师以及对 20 世纪中国学术界的影响和他具有的特殊地位被收录的。本书中,只有张岱年先生是在 21 世纪离世的。

也许是巧合,书中人物除了俞樾(1821 ~ 1907)、廖平(1852 ~ 1932)、严复(1854 ~ 1921)、张元济(1867 ~ 1959)、蔡元培(1868 ~ 1940)、章太炎(1869 ~ 1936)等人外,大多是在 19 世纪的最后 20 年出世的。像柳诒徵(1880 ~ 1956)、陈垣(1880 ~ 1971)、鲁迅(1881 ~ 1936)、马一浮(1883 ~ 1967)、刘师培(1884 ~ 1919)、吕思勉(1884 ~ 1957)、熊十力(1885 ~ 1968)、黄侃(1886 ~ 1935)、钱玄同(1887 ~ 1939)、沈兼士(1887 ~ 1947)、陈寅恪(1890 ~ 1969)、胡适(1891 ~ 1962)、郭沫若(1892 ~ 1978)、赵元任(1892 ~ 1982)、汤用彤(1893 ~ 1964)、范文澜(1893 ~ 1969)、顾颉刚(1893 ~ 1980)、梁漱溟(1893 ~ 1988)、吴宓(1894 ~ 1978)、林语堂(1895 ~ 1976)、金岳霖(1895 ~ 1984)、钱穆(1895 ~ 1990)、冯友兰(1895 ~ 1990)、傅斯年(1896 ~ 1950)均是。自陈寅恪以下 14 人均出生在 19 世纪 90 年代,仅同时出生在 1893 年者就有汤用彤、范文澜、顾颉刚、梁漱溟 4 人。林语堂、金岳霖、钱穆和冯友兰 4 人则都出生在 1895

年,其中钱穆和冯友兰竟然还是同一年遽归道山。牟宗三(1909 ~ 1995)、张岱年(1909 ~ 2004)和钱鍾书(1910 ~ 1998)在侪类中,论年齿,就是少壮派了。差不多相同的社会生活阅历,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可以相互碰撞和交流的时机和空间。他们中的大多数都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尤其是经历了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他们的命运和中华民族一起经受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存亡续绝和保家卫国成为最为迫切的话题。西安事变后,蔡元培先生为促使蒋介石同意改编红军为八路军,支持共产党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以古稀之年不辞劳苦到南京力劝蒋介石,并不惜以绝食三日明志,留下了一段佳话。当然,他们中还有一部分经历了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坎坷曲折和政治运动。

由于本书既非师门忆往,也非故旧缅怀,所以除引用文献外,文中均直接称呼姓名而不再冠以“先生”等称呼。此系体例要求,绝不含亵渎先贤或有所不恭之意。谨此说明。

任士英

2006 年 8 月 10 日

目 录

序 言	1
前 言	1
门秀三千士,名高四百州	
俞 樾	1
多变人生,短命才子	
刘师培	12
敢为天下先的思想家	
严 复	27
维新领袖,新学先驱	
康有为	39
独为神州惜大儒	
王国维	51
传统中国的最后尊严	
辜鸿铭	65
万流归宗的学林泰斗	
梁启超	77